

《春秋》的“经史之辨”与“真伪之辨”

——对熊十力和康有为相关论述的比较研究

□ 张庆熊

内容摘要 《春秋》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对《春秋》的“经史关系”与“真伪关系”做了深入的探究。在这本书中熊十力没有直接提到康有为的名字,但从其内容看是针对康有为的。这从《十力语要》中对康有为的批评中可以得到印证。熊十力批评康有为学问浮夸肤浅,虽扬三世义,但不懂经与史的关系,不知《春秋》三世义与《易经》的革故取新说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春秋 经史之辨 真伪之辨 熊十力 康有为

作者 张庆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上海 2000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方法论新形态及中国化研究”(17JZD041)

《春秋》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从汉代起,众多学者对《春秋》及其三传的主导思想、历史事实和真伪问题展开过长期、激烈的争论。这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而且与政治相关,涉及政权的合法性和革命的合理性的问题。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深入探究了《春秋》的“经史之辨”与“真伪之辨”的问题,主张不应把《春秋》三传对立起来,因为不治《左氏传》,不明其事,不治《公羊传》和《穀梁传》不明其义,对清代以来至康有为到达顶点的“疑古论”观点进行了批驳。

《春秋》“经史之辨”

《春秋》有一部经三个传,即《春秋》经、《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中国儒家最古老的经典之一。由于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有“孔子作春秋”和“孔子修春秋”的不同说法,再加上这三个传的观点和文字书写的方式存在差别,在中国的经学史上从汉代至清末发生过多次重大的争论,而且这些争论又跟政治斗争纠结在一起,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

的重大事件。

熊十力是一位哲学家,他在《读经示要》中主要阐发儒家经典中的哲学观点,而不是做历史的考证。但有关《春秋》“经史之辨”和“真伪之辨”与他要阐发的《春秋》的社会历史观相关联,所以他必须首先澄清这两个问题。概而言之,熊十力的观点如下:(1)《春秋》是经,是孔子所作;(2)《左氏传》不是伪作,应尊重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左氏传》是左丘明所作的判断,尽管在后来流传的过程中可能添加和更改了一些内容,但这是诸多古代书籍在所难免的现象;(3)左丘明不是孔门弟子,他所传的是与孔子所作《春秋》相关的历史,而不是《春秋》的经义;(4)《穀梁传》是后起的,它大致传达和解说《春秋》经中有关礼制和伦理规范的“大义”,但没能传达和解说《春秋》经中有关“三世说”的社会历史观的“微言”;(5)《公羊传》既传大义又传微言,最得孔子真谛,因此他将《公羊传》为主阐发孔子《春秋》的社会历史观。

对于《春秋》经的传解,自汉代起就出现《公羊传》《穀梁传》与《左氏传》争立的局面。这种争立表面上缘



于今文和古文的文本差别,实际上在于观点差别。文本差别只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汉代儒家经典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孔子口授给子弟,一代接一代通过口授传承下来,到了汉代用当时流行的隶书文字书写到竹帛上,故称“今文经”;另一个来源是原本就是书写在竹简上的古文经籍,由于秦始皇执行焚书坑儒政策,孔门学子不得不把这些经籍藏匿起来,到了汉代重新被发现,其中有从孔府夹墙和密室中找到古文尚书和《左氏传》的说法,这些文献是用先秦的篆字古文写的,故称“古文经”。《公羊传》和《穀梁传》属今文经,而《左氏传》属古文经。

如果只有文本差别,今文经和古文经应是互补的。然而,这三传在解说的方式和思想观点上也存在重大差别。《左氏传》着重于叙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所以通常被视为历史著作;而《公羊传》和《穀梁传》着重于解说《春秋》的经义,所以通常被视为解经著作。就此而论,《公羊传》《穀梁传》与《左氏传》的争立,表现为“经史之辨”。一方面,任何历史著作,只要不是纯粹的史料堆积,都包含义理,因为只有当按照一定的义理来叙事历史事实,才能让人理解,起到教化和以史为鉴的作用。《左氏传》同样如此。另一方面,《公羊传》《穀梁传》虽然偏重于解说义理,但它们都是结合具体人物和具体事件来解说义理,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历史著作。因此,在经史之辨的表面形式下它们之间的争立实质上是思想观点之争。《左氏传》的立意是在现存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梳理出社会治理和军事成败的策略上的原因,从策略上的得失来评说国家兴亡和政治人物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带有一些法家和纵横家的色彩。《公羊传》和《穀梁传》的立意是确定伦理标准和价值观念,以“正名”的方式来评价历史人物及其行为。此外,《公羊传》还包含“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的社会制度构想和社会演化顺序的论述,怀有为汉朝立法乃至为万世立法的政治意图,甚至带有超越现存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和实现“大同”的社会理想。

由于这三传在观点上差异,就导致对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春秋》是部什么样的书以及孔子是否作《春秋》的争论。董仲舒、何休等今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倾向于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素王”,以微言大义为万世立法。刘歆、杜预等古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

倾向于强调孔子一贯祖述尧舜,述而不作《春秋》本据鲁史而修,以古已有之的“垂法”和“旧章”加以评说。按照熊十力的看法,有关孔子只是“修春秋”而非“作春秋”之要害在于断定“《春秋》只是史书,不得为经”。这一观点集中体现于魏晋时的人物杜预的《左氏传集解》序:“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引证了杜预的这段话,指出杜预以“宗周公”的方式“抑孔子”,其意图是把《春秋》这部“制万世法之大经”降为“记事之史书”。^[1]

今文经派并不否定《春秋》的史料来自策简上鲁史,也并不否定孔子的思想上承尧舜周公,但强调孔子制《春秋》之义拨乱反正,这是尧舜乐于见到的事情,这也能启迪后圣,为后世开辟道路。《公羊传》的最后一节道明孔子作《春秋》的意义:“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未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熊十力指出,孔子作《春秋》的说法首见于《孟子》,孟子仅后于孔子百余年,孟子的说法“必不妄”。孟子为何要说孔子作《春秋》呢?这是因为孔子自己说《春秋》之义来自孔子自己,这是孟子给出的无可辩驳的理由。“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机》,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篇》)这表明,虽然史实是有关齐桓、晋文等人物的行为,史料来自鲁国等史书的记载,但是《春秋》的意义发自孔子自己。那么,什么是《春秋》的意义呢?孟子道明:“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篇》)如果《春秋》不是孔子作,何来“知我罪我”的说法呢?正因为孔子通过《春秋》阐明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所以人们可以通过这本书理解孔子,而乱臣贼子会因为这本书怪罪孔子。因此,熊十力反诘:“使

如杜预之说,只是钞录旧史,则孔子何故曰其义则丘窃取,又云知我罪我,皆以《春秋》哉。”^[2]

《春秋左传》的“真伪之辨”

熊十力强调孔子作《春秋》,主张《春秋》经的义理在于“三世说”及“万世法”,《春秋》三传“当以《公羊》为主”,因为“孔子大义微言惟《公羊》能传之”,认为《左氏传》是一部相对独立的有关《春秋》的“记事之史”,并不传《春秋》的微言大义。^[3]然而,熊十力在有关《左氏传》真伪问题上持十分审慎的态度,他考察了有关《左氏传》真伪之辨的历史由来,认为从这些证据中不足以得出《左氏传》是伪作,也不足以否定《左氏传》的原初作者是左丘明,尽管《左氏传》在流传过程中可能被添加或修改了一些内容,已非左丘明的原本,但这种现象不是《左氏传》独有的,其他古代经籍也在所难免。这与康有为“遍疑群经”的武断态度截然相反。康有为主张“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者皆刘歆伪造;刘歆作伪经是为了佐王莽篡权,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著。”^[4]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没有直接驳斥康有为,但从其考证的内容看很多方面是针对康有为的推断的,揭示康有为治学“浮乱”^①。康有为为什么推断《左氏传》是伪作呢?他在《新学伪经考》中提供如下理由:“古学感人最甚,移人最早者,莫若《汉书》。……余读《史记·河间献王》《鲁共王世家》,怪其绝无献王得书、共王坏壁事,与《汉书》绝殊。窃骇此关‘六艺’大典,若诚有之,史公何得不叙?及读《儒林传》,又无《毛诗》《周官》《左传》,乃始大疑。又得魏氏源《诗古微》,刘氏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反复证勘,乃大悟刘歆之作伪。而卒无以解《汉书》也,以为班固校书,本从古学而然耳。今按葛洪《西京杂记》,谓:‘《汉书》本刘歆作,班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乃知《汉书》实出于歆,故皆为古学之伪说,听其颠倒杜撰,无之不可。”^[5]

康有为在《重刻伪经考后序》中复述了他论证《左传春秋》等古文经为伪经的主要理由。

夫推经学所以迷乱乖迕之由,盖出于刘歆伪为古学以乱真经之故。……偶得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读之,乃无“得古文经”事,大惊疑。乃取《汉书》河间献

王、鲁共王《传》,对校《史记》读之,又取《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对读之,则《汉书》详言古文事,与《史记》大反,乃益大惊大疑。又取《太史公自序》读之,子长自称天下郡国群书皆写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世父子纂其业。乃翻金匱石室之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则子长于中秘之书、郡国人间之藏,盖无所不见;其生又当河间献王、鲁共王之后,有献书开壁事,更无所不知;子长对此孔经大事,更无所不纪。然而《史记》无之,则为刘歆之伪窜无疑也。加以师丹大怒,公孙禄、范升严劾,龚胜称病,诸博士严拒,乃知古文之全为伪,駭然以解矣。于是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遍考周、秦、西汉群书,无不合者。虽间有窜乱,或儒家以外杂史有之,则刘歆采摭之所自出也。于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万理千条,纵横皆合矣。^[6]

概括上述两段话,可见康有为论证《左氏春秋》等为伪经有以下三个理由:(1)《史记》中没有“献王得书、共王坏壁”的记载。司马迁是河间献王、鲁共王之后不久的人,应该了解那时的事情,《史记》既为他们作传又为什么缺乏对如此重大事情的记载呢?但为何《汉书》又有这样的记载呢?后来发现葛洪《西京杂记》指出《汉书》本刘歆作,班固不过略微删节而已。由此可以断定:《左传》等古文经书皆是刘歆伪作,而《汉书》为其来历颠倒杜撰,其他书籍中有关古经的此类说法皆肇始于刘歆的篡改。(2)与刘歆同代的师丹、公孙禄、范升、龚胜等博士反对古文经,乃知古文之全为伪。(3)刘逢禄、魏源等清代学者对《左氏春秋》《毛诗》等古文经的真实性加以质疑。^②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没有直接反驳康有为的论证,可能他不便在公开著作中批评康有为,或认为康有为的论据来自别人,不过是搬运工而已。所以,熊十力只对以上论证加以驳斥,揭示其逻辑存在明显漏洞。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没有谈到“献王得书、共王坏壁”,但明确记载了左丘明是《春秋左传》的作者及他写作该书的缘由。由此至多只能怀疑“献王得书、共王坏壁”的真实性,但在逻辑上不能推导出《左传》等古文经籍为假。怎么能够一方面以《史记》为证,另一方面又否定《史记》的相关记叙呢?有关左丘明作《左氏春秋》,司马迁清清楚楚写道:“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

《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洽: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熊十力引证了《史记》中的这段话,指出司马迁的记载应是可信的:“余以为论经籍者,当征诸《史记》,史公世为史官。博识旧闻,且生当汉初,去古未远,其所记述,自可信据。”^[8]根据这段话,熊十力认为,孔子作《春秋》,向七十子传授口义,但子弟在口传中未免发生偏差,左丘明为史家,惧他们各安其意,失其真,为保存史实,专注于孔子《春秋》的相关史料,成《左氏春秋》。《左氏春秋》是一部与《春秋》经并行的《史书》。“孔子制万世法,是为经学。丘明则保存史实,只是史学。”^[9]

根据《左氏春秋》提供的史料和文本的古文古字,会引申出一些与《公羊传》和《穀梁传》不同的对《春秋》经的理解,再加上汉代经学博士政见不同和派别之争,当刘歆欲立左氏,为其古文经派争夺地位的时候,遭到今文经派博士的反对,这是可以理解的。康有为以师丹、公孙禄、范升、龚胜等今文经博士反对古文经为理由,推断古文经为伪。他不首先弄清楚这些今文经博士为什么反对古文经。是因为他们认为古文经是伪经,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只有当因为前者,其推断才能成立,然而他们压根也没有提到《左氏春秋》等古文经为伪作,而是出于其他缘由。熊十力指出:“刘歆欲立左氏,以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为言。而博士惟争丘明不传《春秋》,并不谓作传者非丘明也。可见博士之论,与《史记》所载之事实全同。作传者为丘明,汉人承晚周传授,都无异说。后人妄兴疑难,徒为多事。”^[10]熊十力在这里说的“妄兴疑难”的“后人”,想必也包括康有为在内。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刘逢禄(1776—1829年)、魏源(1794—1857年)等学者兴今文经,对古文经多加质疑。刘逢禄在《左氏春秋考证》中怀疑左氏非丘明,认为《左氏春秋》的作者必定是孔子之后的人,该书是刘歆改窜后的作品。康有为自称他有关《春秋左传》是刘歆伪作的观点受到刘逢禄的启发。熊十力详细辩驳了刘逢禄提出的论证,也可视为间接地回答康有为的

质疑。熊十力指出,《左氏春秋》中的问题,唐宋时就有人觉察,如郑樵(1104—1162年)在《六经奥论》提出八个“明验”,推断“左氏非丘明”,《左氏春秋》是战国时作品。其中最明显的一处是,《左氏春秋》谈到“赵襄子之谥”,由此推算《左氏春秋》最后的纪事比孔子《春秋》经最后的“西狩获麟”纪事延长了80年,比孔子卒年晚了78年。假如左氏就是孔子《论语》中谈到的鲁史官左丘明,那么他应该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不可能活得那么久。此外,《左氏春秋》谈到的一些军队编制和祭典制度被认为战国时才有的,如“腊祭”。《史记》中有“惠文君十二年始腊”语,这表明战国时秦惠王十二年才开始有腊祭。再者,《左氏春秋》叙晋、楚之争最详,如“楚师燔犹拾沈”等语,由此看来左氏应为楚人。

对此,熊十力认为这些考证值得商榷。可能的情况是,左丘明作《左氏春秋》,后人增添或窜改了一些史料及用语。有的考证很可能错了,如:《史记》中的“惠文君十二年始腊”语,据唐代开元年间史学家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应理解为“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即“腊”祭早就有了,并非始自秦惠王。《春秋》时晋、楚两强相争最持久,序晋、楚事最详,是纪实的缘故,并不能以此断定左氏为楚人。“唐、宋人疑左氏非丘明,大抵疑《左传》文字有诬谬处,或涉及六国时事。不知古代简策,易致残脱,后世好事者,妄为附益,或以更私意改窜。”^[11]

刘逢禄在《左氏春秋考证》中提出的疑点大多数来自前人。不过,他也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考证。他比对《春秋》经和《左传》,发现《春秋》中不少年月的经文,《左传》缺乏对此的传文。《左传》对有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详加叙述,而对另一些则略而不提。如果《左传》真的是左丘明为《春秋》经作的传,那么凭其做过史官的经历和所掌握的史料,阙文不应如此之多。但是,这一论证也很牵强。因为按照文献记载,原初的《春秋》经与《左传》的关系,并不像现在那样经与传逐一相随,即每一年份的经文都跟着传文,而是经是经,传是传,经与传是各自独立的书。再说,《左传》是古文,而刘逢禄比对的《春秋》经是今文,要它们逐一相符,勉为其难了。

对此,熊十力引证钱大昕(1728—1804年)有关古文左氏经与传的关系的论述,表达自己在这个问题上

上所持有的非常审慎的态度：“《汉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班氏无注。钱大昕曰：‘谓左氏经也。汉儒传《春秋》者，以左氏为古文。《公羊》《穀梁》为今文。称古经，则知其为左氏矣。’《汉志》又载有《左氏传》三十卷。班氏注云：‘左丘明，鲁太史。’说者谓左氏经与传各为单行本，故《汉志》分载之。今左氏古经本，已不可考。甚足惜也。使其尚存，则见存《左传》之阙文，可资考核。”^[12]

刘逢禄根据转述前人和他自己的考证得出如下结论：“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檮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刘歆强以为传《春秋》，或缘经饰说，或缘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时。遂不暇比附经文，更缀数语。要之，皆出点窜，文采便陋，不足乱真也。”^[13]这段话强调，《春秋左传》的作者不是与孔夫子同代的左丘明。它本是战国时人根据晋、楚的史料合编成的史书，而刘歆为了把它打扮成孔子《春秋》经的一部传，按照鲁国纪年方式，加以拼凑编辑，使之与经文的年月和事情相附随。然而，它往往比年阙事，漏洞很多，不难识破它是刘歆的伪作。康有为有关《左氏传》的观点与刘逢禄相似，只不过更进一步，断言刘歆根据古本《国语》的史料，依照《春秋》的编年加以编纂，伪造了《左氏传》：“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穀》，《公》《穀》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穀》者，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14]

在熊十力看来，《左氏春秋》在流传的过程中有所增窜是可能的，刘歆为了其政治目的改窜部分字句也是可能的，但不能由此断定《左氏春秋》原初的作者肯定不是左丘明：“刘逢禄以为刘歆改窜传文，其说决不尽诬，且非独刘歆而已。如涉及六国时事者，当由战国季世之为左氏学者所增益。如庄子书末后诸短篇，显为其后学所增入。即杂篇中，亦时有增窜处，前人论及此者已多。古书全无人改窜者盖甚少。《左传》之失其真，当六国之季世已然，不必自刘歆始也。”^[15]

结语

有关《春秋左传》是否刘歆按照鲁国《春秋》的编年伪造而成的问题，这在今天应该是有定论了。《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中有120多枚竹简，共3100多字，记载了《左传》中从襄公九年襄公十年的部分内容，经比对与目前流传的《左传》内容基本一致，编年相同。这篇竹简经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碳-14测定为公元前340年前后的文物，出土于楚国，首次证实《左传》的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时期，这足以证明宋代以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主张《左传》为西汉刘歆伪作说法绝对不能成立。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对《春秋》的“经史之辨”和“真伪之辨”的探讨，只是他对《春秋》解经中的绪论性部分，为他后面对《春秋》社会历史观的论述做了重要的铺叙。熊十力区分了《春秋》的“微言”与“大义”。在他看来，“微言”主要指以“三世说”为核心的社会历史观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制度总则“万世法”；而“大义”主要指评判历史事件和人物行为的基本准则，这在当时主要通过“礼义”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说“礼义”主要是用来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的话，那么“三世说”则是社会变革的引导。因此，“三世说”在统治者的高压下最不宜直言表达，只能隐现在“微言”中。熊十力写道：“《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者，如于当时行事，一裁之以礼义。……微言者，即夫子所以制万世法，而不便于时主者也。”^[16]与此相应，熊十力认为在春秋三传中，《公羊》既解说“大义”又阐发“微言”；“《穀梁》虽粗识大义而不知存微言”^[17]；《左传》则只重史实而不传春秋经文的微言大义。按照这一思路，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首先安顿《春秋》的经与史的关系，然后解说“微言”与“大义”的关系，最后依据“三世说”阐发他的社会历史观和社会制度变革的思想。

从表面上看，熊十力的这一观点类似于康有为，但这里存在重大差别。熊十力在《十力语要》中多次批评康有为，认为康有为虽扬三世义，但虚张条例，学问浮夸肤浅，不懂经与史的关系，不知《春秋》三世义、《礼运》小康大同说与《易经》“革”“鼎”二卦的革故取新说之间相互发明的关系。他在给沈生的书信中指出：“《春秋》本素王改制之书，汉儒犹能绍述，宋儒程

伊川亦言之,至近人康有为而益张。然有为虽扬三世义,但虚张条例。张孟劬先生讥其浮浅,诚然。故学者于康氏书可以涉猎,然必习群经、诸子并三传及诸儒著述。”^[18]熊十力在《读经示要》没有提到过康有为的名字,但可以看出他从学理上对康有为的观点展开批评。熊十力论证《春秋》的史实与“微言大义”中包含的社会改革思想之间的辩证关系。熊十力倡导共和革命,他的观点不仅比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的观点更加激进,而且包含更加深刻的社会历史观。熊十力年轻时就反对康有为拥清廷的君主立宪改良,而投身于共和革命。他在《何自新传》中回忆他们当时发起组织武昌革命党团的情况:“康有为欲拥清廷以图强,清室素内猜,非覆清不足自树立。遂与十力共游江汉,欲物色四方豪俊,而与之图天下事。”^[19]从表面上看,康有为和熊十力在有关《春秋》是孔子所作的经的问题上持相同看法,在落实到政治主张上,其思路就大不相同。康有为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路是,把孔子立为“教主”,把《春秋》经立为中华宪法的依据,拥戴清廷君主立宪达到社会改良之目的。熊十力共和革命的思路是《大易》中本身包含变革的思想,《春秋》“三世说”是《大易》变革思想在社会历史观中的体现,共和革命是本体大用流行的必然结果。孔子是认识大道和立志实现大道的革命家而不是教主,要通过发动民众起义推翻清廷实现共和革命之目的。熊十力以《大易》的结构演变和社会历史“日新”观点解释“三世说”,这是他“大用流行”的体用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用。

熊十力和康有为在政治主张上的差别,落实到对经学的解释上就产生如下差别:(1)对于熊十力而言,“微言”的“三世说”应该运用于当下,当下就处于革命时期,当下就应该推翻帝制,进行共和革命。对于康有为而言,“微言”的“三世说”只能应用于将来,现在由于民智还不成熟,应执行君主立宪,现在只能由立宪的君主和贤明的大臣来管理政务,至于民主政治和大同社会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2)对于熊十力而言,“大义”指儒家的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原则,他指望通过激发民众的良知来发扬和推广儒家的仁爱的大义。对于康有为而言,“大义”主要指“正名”,即按照君臣、父子等政治和社会的等级制度的名分来行事,规范每个人的道德行为。康有为希望建立的是一套权威制度,把儒家立为国教,把孔子立为教主,把儒家的经典

奉为像宗教经典那样的权威经典,自己当国师,进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熊十力则认为民主的标志是《易经》中所说的“群龙无首”,即民主社会中的每一个公民都是独立自主的“龙”,因此不需要什么“教主”和“国师”。熊十力以《大易》的结构演变和社会历史“日新”观点解释“三世说”,这是他“大用流行”的体用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用。

注释:

① 康有为早年受学于九江朱次琦。熊十力在给他学生韩裕文信中指出,康有为没能从他老师朱次琦那里踏实求学,治学态度“浮乱”。“昔者康有为从朱九江一年急离去,终成一浮乱名流,康氏之学实浮乱。向者张孟劬先生尝言之,而时贤每不辨也。晚而推尊九江,究何得于九江乎?若果长与九江处,薰陶加深,或不至太不成样也。”(熊十力《十力语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页)

② 魏源《诗古微》讨论《毛诗》问题,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略而不谈。

参考文献:

- [1][2][3][7][8][9][10][11][12][13][15][16][17] 熊十力.读经示要.长沙:岳麓书社,2013:341-344、342-343、345、346、346、347、347、347、349、347、347、352、352.
- [4][5][14]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55、416-417、398.
- [6]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88:416-417.
- [18][19] 熊十力.十力语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66、97.

编辑 阮凯

over-defense, everyone becomes a victim and will become an aggressor; For society, the social trust system will be deconstructed and ruined, and even to collapse; For the country, the general purpose of deepening its all-round reform and 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 are seriously affected, even to suffer disorder. Extreme egoism and negative function of the law are responsible for mutual aggression in society since 1978. Therefore, the strategic goals of the law are regulating and adjusting the interests, preventing extreme egoism, and transforming mutual aggression into mutual benefit.

Key words: mutual aggression in society;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egoism; altruism; rule of law

Characteristic Small Towns: Role Conflict and Scheme Adjustment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Rural Vitalization Policy

Yao Shangjian

Abstract: From the agricultural tradition to the modern society,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China has dual logic. Since the 1980s,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has made rural issues and urban problems appear alternately.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towns, which have two forms of villages and towns, have entered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s and formed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The appearance of characteristic small towns may form a breakthrough of this conflicting policy. In the characteristic small towns planning, we must clearly define the role of the characteristic small towns. In other words, is the characteristic small towns a rural plan for urban problems or an urban plan for rural issu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aracteristic small towns can help resolve the conflicts of identity that are not found in cities outside the urban system.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clear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legal support, featured towns may become a transitional public policy.

Key words: urban politics; rural vitalization; public policy; characteristic small towns

The Regional Space Renovation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Point View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the Example of Gaochun "Slow City"

Ye Jihong & Zhang Yangyang

Abstrac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uts the solutions of village problems on a new strategic commanding poin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not only catering the needs of rur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but also satisfying the demands for rural outside groups to pursue pastoral life.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the appearance of International "Slow City" in Gaochun, represents a disparate rural revitalization way from city development. But during its space transformation, it also has unavoidable problems such as the fragmentation of absolute space, the stratification of abstract space and the inversion of differential space. So we need to settle dow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low" development in village and the fast modernization of society, rebuilding the order in countryside and safeguarding the justice of rural space, and maximizing the value of rural space.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pace renovation; Gaochun "Slow City"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on Information Security

Lu Jianjian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rapidly. Information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offensive security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capture a strategic game, a series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events trigge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there is no legislation system that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at present.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on information security, this article will provide a legal perspective for China to maintain information security.

Key words: information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law.

The Classic Principle, Historical Facts and Authenticity of "Spring and Autum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Xiong Shili's and Kang Youwei's Relevant Discussions

Zhang Qingxiang

Abstract: "Spring and Autumn"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fucian classic. In his book "Reading of Confucian Classics", Xiong Shili made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classic principle, historical facts and authenticity about this annals. Xiong Shili did not mention Kang Youwei's name directly in this book, but it was aimed at Kang Youwe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content. This can be confirmed by the criticism of Kang Youwei in his book "Important Quotations of Xiong Shili". According to Xiong Shili, Kang Youwei's style of study is exaggerated. He talked about the Confucian doctrine about history of the three stages, but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aven principle and historical events, and does not kn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thical norms explicated in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ideas of change and innovation in "Book of Changes".

Key Words: "Spring and Autumn"; Xiong Shili; Kang Youwei